

于右任的人生轨迹与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

张 兵, 陈 龙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于右任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诗人, 一生握素怀铅, 勤于创作, 现存诗歌八百余首。他的诗歌创作集中体现了他“人生即是诗”的诗学主张, 但是又不局限于写人生, 而是与时代、革命紧密结合, 爱国忧民, 笔力雄健, 激情奔放。从诗中可以清晰地把握诗人的人生轨迹, 亦可透视 20 世纪前五六十年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于右任的诗歌创作与人生轨迹相契合, 大致可分为三期: 前期(1904 年前), 诗人读书求学, 睁眼看世界的同时思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以诗歌引领时代, 倡言革命, 反清反帝; 中期(1906—1949 年), 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 献身并坚守革命, 创作出大量源于革命体悟的诗, 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 后期(1949—1964 年), 诗人被裹挟至台湾, 在孤独凄凉与翘首期盼中走完人生的最后道路, 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 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 然最具价值的则是“望大陆”系列哀歌。

[关键词] 于右任; 人生轨迹; 诗歌创作; 主题取向

[中图分类号] I 206.5; I 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5)06-0080-07

于右任(1879—1964)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 同时也是书法艺术大家, 但他一生又酷爱写诗, 从少年到老年, 都乐于以诗人自命, 是著名诗人。他一生勤于创作, 吟咏颇多, 成就卓著, 现存诗八百余首, 被柳亚子誉为国民党诗人最高明者。早期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以下简称《诗草》)的全本长期湮没, 近年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抄本^[1], 还原了于右任早期诗歌的面貌。2006 年, 于媛主编的《于右任诗词曲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付梓, 这是“于先生逝世四十年后, 收集最全的诗歌集”^[2](前言, P5), 为研究于右任诗歌提供了基础文本。本文谨以《诗草》抄本和《全集》为底本, 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分期探讨其诗歌的主题取向。

前期(1904 年前)

青年时期的于右任曾游学于陕西宏道、味经、关中三大书院, 读书日多, 见闻日广。其父因刻书之故, 常与传教士莫仁安、敦崇礼往来, 这为于右任阅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文献提供了便利, 在耳濡目染中逐渐向新学靠拢。其后师从朱佛

光、刘古愚, 对新学和维新变法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思想日趋激进。于右任的早期诗歌主要辑入光绪二十八年(1902)集印成册的《诗草》中, 《诗草》一经刊印即风行全国, 引起清王朝的关注与不满, 诗人亦因此几踏入文字狱鬼门关, 终辗转潜往上海。其时正值 19、20 世纪之交, 帝国主义加紧侵华, 中国这艘古船摇摇欲坠。甲午战后, 社会改良思潮昙花一现, 革命火种悄然酝酿, 《诗草》可谓应运而生。

《诗草》之胜, 在思想而非意境, 其内容不比《警世钟》、《猛回头》和《革命军》逊色^[3](PP. 47—48)。观察到苗头的陕西巡抚上书光绪皇帝:“(于右任)实系有心倡逆, ……其自号曰铁罗汉, 其自比曰谭嗣同, 其词意则语语革命, 语语劝人为叛逆。”^[4]虽有夸饰, 大体非虚。首先, 《诗草》不遗余力地鞭挞了帝国主义的贪婪与清廷的腐朽。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凭恃武力迫使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豪夺巧取, 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庚子赔款”, 本息即达“九万万两”^[5](P2019), 约抵清朝十余年岁入。然而, 赔款只是侵略者攫夺利益之一种, 他如政治、文化、资源、

[收稿日期] 2015-0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诗歌流变与转型研究”(12BZW076)

[第一作者简介] 张兵(1965—), 男, 甘肃会宁人, 文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军事等等，无孔不入。《从军乐》切中肯綮：“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侮国实系侮我民，沁沁侃侃胡为尔！”封建王朝的辉煌已成水中月、镜中花，侵略者如此鄙视中华国民，使出浑身解数将落后的中国及其子民辱没殆尽。对此，清政府不但不予坚决的回击，竟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6]（P23）。国家面临财政崩溃的局面，但当政者却在增加税种，转嫁税额于穷苦百姓，“层层盘剥，税及毫厘”^[5]（P2024），或竟卖官位、借外债剜肉补疮，极尽腐朽之能事。诗人义愤填膺，比统治者为“狗”，并厉声质问：“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署中狗》）朝廷无以依靠，诗人继而发出“自造前程”的呼声，宣扬用革命推翻清王朝。《杂感》（其二）对当时中国之命运做了准确的分析：“一棒不能创，一针不及病。”地广物博及帝国主义矛盾的存在，使得帝国主义不可能一下子“吃掉”中国。但是，洋务运动、改良变法的先后失败，表明局部革新不能挽狂澜，全方位彻底“破坏”的时代已经来临。《改革诗》八首题为“改革”，实言革命，诗人从“血”、“泪”、“舌”、“胆”、“魂”、“粹”、“笔”、“铁”八个方面，对革命之必然、对象、途径等做了回答，可视诗人早期革命思想的纲领，其中《改革诗·血》写道：

骷髅堆起太平开，流血才为济变才。
肝脑中原留纪念，牺牲七尺造将来。
草菅世界新公理，菜市男儿大舞台。
滚滚满腔何处洒，舍身殉国莫悲哀。

诗歌拈出一批血淋淋的词语：“骷髅”、“流血”、“肝脑”、“牺牲七尺”、“舍身殉国”，营造出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和视死如归的气魄，足见诗人激进的思想与革命的决心。综观全诗，诗人渴望建成平等自由、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尽管诗人没有提出明确的建国目标，但绝非没有理想。《自由歌》云：“不自由，毋宁死，俯首帖耳非男子。天赋人权有界限，蛮奴蛮奴侵略手段横至此！言论风生真理出，心血点点争淋纸，蛮奴蛮奴箝束言论竟如是！……要知此权我不自弃人焉夺！……不自由，毋宁死；争不得，势不止。”“不自由，毋宁死”，这是当时西方流行的哲语，诗人引为主旨，开门见山亮了出来，语气坚定，气势凛然。此诗立足于“自由”，斥列强和清政府为“蛮奴”，指出不论越界侵犯别国的自由，还是“防民之口”剥夺言论的自由，与天赋人权、人权有界限是相违背的。

诗人强调，只要众人不主动弃权，别人就无法夺权，即使牺牲也要求得自由。诗以“自由”为题，实则隐括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国的、国民的）“独立”、（国的、国民的）“自由”等理念，这些理念同时也是理想的目标指向。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诗人倡导的建国理想历史地转向他途，但《诗草》的进步思想不灭，所追求的“未来”也并非完全的“乌托邦”。可以说，《诗草》当属“真的革命文学”^[7]（P124）。

《诗草》中还有不少咏古、咏史之作，当以七言绝句《兴平咏古》三十四首为代表。光绪二十八年（1902），兴平令杨氏闻于右任名，延请为西席。兴平历史悠久，古代遗迹颇多，诗人游而生感，即留下了组诗《兴平咏古》三十四首。组诗吟咏的对象，集中于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兼及杨贵妃等帝王妃子。吟咏的本意，是借咏古之名行咏怀之实。组诗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感怀古人古事，现实色调不强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二。如《郭解》、《李寻》、《贾逵》、《司马相如》，凡此诸篇记叙历史故实、就事论事，较少观照现实。例如《萧何曹参墓》虽批驳曹参为“庸臣”，但大体仍为“萧规曹随”典故的诗演。另一类，虽咏古、咏史，但笔锋直指现实，感愤之情深切，爱憎分明。这类诗歌常夹叙夹议，论点颠覆传统，或为时局的再现，或为近代思想的另类表述。如“断送支那无寸土，前朝返照又重来”（《刘瑾》），即以刘瑾误国之史实，比喻清朝朝政混乱、国土沦丧，显然是以古喻今。又如《汉武帝冢》云：

绝大规模绝谬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诗人以为，相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的连年征战根本不值得去评价，他的最大错误在于绝言论、绝奇才，为神州埋下不幸的种子，本质还是为言论自由正名。总之，前类诗歌透出“识”之广博，后类更显“见”之锋芒，整组诗用典信手拈来，议论独出机杼，尤显思想锋芒。

革命、反帝、反清，这是时代的最强音，《诗草》集中对此进行抒唱，称其为“时代的诗”，并非夸张。在《诗草》中，诗人还大量运用新词汇、新理念，响应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诗界革命”，为新派诗添砖加瓦。关于此类诗歌的影响，诗人也非常自信：“振臂一呼十五年，风云子弟各争先。”（《二华道中》）因此，有学者说《诗草》是诗人

“献身革命之赞礼”^[8](P66), 当为确评。

中期(1906—1949年)

1906(光绪三十二年)到1949年,于右任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中,诗歌创作也最为活跃。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中共和谈均属革命基本范畴,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必要实践。1941年赠冯玉祥的《题〈训词手册〉》即言“革命告成功,世世作真赏”,1942年鼓舞抗战的《万年歌》说“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要实现”,均为这一思想的真实体现。北平谈判时,于右任主和,践行的也是这一思想。刘永平《秣陵杂咏四首呈于右任院长》(1948年)即可证之:“中枢一老主和议,免使江南付劫灰。”^[2](P266)因此,自光绪三十二年于右任加入同盟会,历经辛亥革命、倒军阀、抗日战争、国共和谈,构成了他“三民主义”的革命人生。于右任的中期诗歌与革命步伐相吻合,明显地分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1906—1910年)、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1911—1936年)、抗日战争开始至赴台前(1937—1949年)。

1. 辛亥革命前(1906—1910年)

于右任1906—1910年创作的诗歌今存31首,主要依托两次沪陕往返的见闻表达“世网”艰难、思乡念亲和“神州恨”的积郁。诗人戴罪跋涉逃难,备尝羁旅之苦、念亲之切。试读《入关》:

虎口余生再入关,乌头未白竟生还。
垂青无几灞桥柳,鼓掌一人太华山。
慷慨歌谣灵气在,忧愁风雨鬓毛斑。
倚间朝暮知何似,辛苦莫论世网艰。

逃亡四年后,为探望病危的父亲,诗人入关归里。诗的首句说没想到虎口逃生,头白前竟能活着回来,自嘲的口吻揭示出时事的艰辛与内心的酸楚。“入关”看似是幸事,实为大不幸。“灞桥柳”、“太华山”如旧,昔日的慷慨之歌响彻耳旁,只是增加了许多忧愁,受过风雨洗礼的鬓发变得斑白。诗歌末两句砌入“倚间”典故,假想父亲早晚倚门望子归去的情景,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人生苦楚、“世网”艰难,诗人感慨无限。一年后,父亲病逝,诗人又一次经历了沉重的打击:“今岁复归来,徒洒孤儿泪。”(《葬亲出关致闾乡》)有家不能归,有父不能养,浪迹之苦、丧父之痛,统统袭来,促使诗人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那些略显“漂浮”的革命意气渐渐消退,他开始重新思考革命与社会

等重大问题。诗穷而后工,这些苦难的生命体悟融入诗中,极易引起大众的共鸣,走进读者的心里。此外,这一时期诗人还有一些表达“神州恨”的诗篇,既有古体诗《马关》、《新安早发》、《出关作》等,也有歌体诗《元宝歌》、《劝资政议员歌》(三首)和《劝军机大臣歌》(三首)等。如《出关作》云:

自断此身体问天,余生岁岁滞关前。
逐尘京洛双黄鹄,啼血乾坤一杜鹃。
眼底河山悲故国,马头风雪忆当年。
殷勤致谢关门柳,照见行人莫妄牵。

此诗写于诗人1909年回陕西奔父丧之后的归途中,与《入关》诗相呼应,多化用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春望》等诗诗句,抒发自己奔走革命、屡遭挫折的失意情怀和对祖国河山的忧愤之思。“马头风雪忆当年”,是在追忆前一年冬天回乡探视父病,行色匆匆。于右任这一阶段的古体诗侧重反映故国之悲,并表达再造神州的强烈愿望。如《己酉3月26日〈民呼报〉出版示谈吾善》写道:

大陆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
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墓田。

前两句用当时诗人常用的“大陆沉沉”、“哭苍天”等词语,准确地概括了神州死气沉沉、民不聊生的状况。后两句写诗人决意打破“沉沉”局面,挽救苍生,死亦不避的决心。《出关》诗又推崇“汤武革命”:“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可见,早期革命的种子已植入诗人的骨髓,此刻正从“浮”向“沉”转变,内蕴沉着之力量蓄势待发。不难看出,于右任这一阶段的创作,过渡性特点尤为突出。

于右任的歌体诗以民间歌谣或曲的形式呈现,嬉笑怒骂、讽刺深刻,旨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的黑暗。早于胡适《尝试集》的《元宝歌》写道:

一个锭,几个命。民为轻,官为重。要好同寅,
压死百姓。气的绅士,打电胡弄。问是何人作俑,樊
方伯发了旧病。请看这场官司,到底官胜民胜。

此诗揭露官官相护、钱贵民贱的社会现象,写尽官僚和绅士丑恶、滑稽的嘴脸。这是一首我国较早的用白话写就的诗,至于是不是第一首,还可以再商榷^[9](P32)。

2. 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1911—1936年)

1911—1936年,诗人投身革命一线,先后参加反袁斗争,统帅陕西靖国军,赴苏敦请冯玉祥归

国靖乱等。这一阶段的诗歌今存 370 余首，是中期创作最饱满的阶段。诗歌以革命为轴心，集中于三大主题：

其一，山河破碎，民生维艰。这是时代的总背景，也是于右任诗歌的底色。如《再过南京杂诗》其二云：“满目疮痍莫倚楼，凄风苦雨遍神州。”辛亥革命前，诗人曾感叹“大陆沉沉”，革命后虽不再“沉沉”了，但情况并未好转，依然是河山凋敝、黎民凄苦。主政靖国军时，诗人亲见军阀暴政、战乱不断、贼盗横行，对百姓的苦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正是这时，他开始创作真正意义上的抒写民生的诗。《宜川道中》有云：“川原如锦人如醉，遍地花开不忍论。”花开遍野，本为宜人美景，谁想这竟是在军阀强迫下种的罂粟！苛政猛于虎，苛税杂如毛，百姓见军阀如见“秦兵”。又加常年混战，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如处水火中。《延长纪事》从大处着笔，写百姓逃难、人去室空：“戍卒一年三溃散，居民十室九逃亡。”比之“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兵车行》），可谓异曲同工，而悲凉之意更浓。1926 年，诗人远赴邻国，那里绿草如茵、自由安详，与祖国形成鲜明对比，不禁泪眼纵横。诗人攥紧拳头：“定烹走狗定中华，一行解放四万万。”（《布蒙共和国立国五周年纪念歌》）

其二，革命漫长曲折，诗人壮志难酬。这是此期诗歌的核心主题。首先，诗人对主要革命事件都做了实录，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足迹遍布祖国南北及域外，革命之漫长艰难尽在诗中得以表述。尤其在主政靖国军和赴苏期间，于右任创作了大量记录翔实的诗。1918—1922 年的诗歌，频频出现“兵火”、“凶荒”、“疮痍”、“国殇”、“中道反戈”等词，基本呈现出诗人所面临的困境，也预告了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围追堵截中惨遭失败之必然结果，所谓“血战历年，苦心孤诣”。试举《闻乡人语》为例：

兵革又凶荒，三年鬓已苍。
野犹横白骨，天复降玄霜。
战士祈年稔，乡民祭国殇。
秦人尔何罪？杀戮作耕桑！

诗人受命于危难之际，其时的情势令人堪忧。1919 年秋冬，陕西又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但战争并不因此间断。白骨横野，天降冷霜，将士饥困，百姓哀痛，整个环境几乎令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这一情势下，靖国军将士又被敌军策反，倒戈相向，诗人

愤而退居民治校园，《民治学校园纪事诗前十首》、《民治学校园纪事诗后十首》即为此期诗人行踪与心情之实录。对于 1926 年赴苏之旅，更可从诗题把握其行程：《黄海杂诗》、《舟出东朝鲜湾》、《西伯利亚杂诗》、《车过乌拉山》、《红场歌》……单从题目即知舟车劳顿、路途遥远。其次，苦闷是此期诗歌的又一基调，这源于革命的曲折反复，诗人壮志未酬。可以说，每有吟哦，常见诗人泪眼婆娑，此期诗中，“泪”、“鬓斑”两个意象的使用不下三四十次，革命之艰难与年岁之逝去时刻碰撞着诗人的心。《不寐》写道：

竟夕不成寐，劳人知夜长。
眼前烛垂泪，镜里鬓生霜。
百草忧春雨，遗黎傍战场。
三年徒负疚，忏悔亦无方。

革命陷入困境，诗人彻夜难眠。泪眼、鬓霜、被拉长了的黑夜，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诗人身倦心愁的形象即凸显出来了。诗中有无助、茫然，有失落、负疚，更有愤懑与无奈。这种心迹并非诗人独有，实是特定时期革命党人群体心态之呈现，普遍而真实。

除了正面抒写，于右任还有侧面透露心境的诗歌。这些作品虽不直接写革命，但又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诗人在写景中暗遣愁情，如《方里纪游篇》之一结句云：“君看东岭上，白云自卷舒。”好一幅赏心悦目之美景，然而，再读诗的前一句，“吾苟平不平，躬耕或未晚”，忧愁自然流露出来。该诗作于 1922 年，正值靖国军失败不久，诗人心境抑郁难平，因此，多数写景诗并非单纯模山范水，而是诗人苦痛心理的另类释放。有时诗人思念故乡，系情家人，如传颂一时的《药王山除夕杂感》其二云：

岁尽天寒客思孤，茫茫何处是归途？
家人倘备宽心面，应念愁城困老夫。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游子的普遍心理。此时诗人兵败被困，四面楚歌，个中滋味绝非“思亲”二字所能诉尽，即使真有碗宽心面，获得的也只是短暂的心安。有时诗人郁闷无端，转而寄情田园：“乡人为道茴香好，手种灵苗带雨归。”（《民治学校园纪事诗》其八）初读之下，只觉旷逸清疏，一派陶诗遗风，然将之置于组诗之中整体观之，方知不过是诗人苦闷之余的一种念想。总之，游景也好，怀乡也罢，甚至一些题图、题画之作，大都展示出

诗人此一阶段的革命心境。

其三，悼念革命志士，反映革命残酷。这也是贯穿于右任中、后期诗歌始终的主题。这一阶段，诗人专门写了大量悼念为国捐躯烈士的诗作，这些悼亡之作绝大多数写于革命低潮时期，诗调低沉悲痛。有的悼念个体，如宋教仁、杨笃生、范鸿仙、沈绶云、陈英士，有的痛悼英烈群体，如黄花岗烈士、滇军阵亡将士等。悼亡的目的，一是以诗纪念，慰藉亡灵，告诸来者。英雄逝去，不留名者居多，何况革命未成，国殇不止。二是以诗招魂，感怀革命情谊。师友凋零，往事历历，诗人感慨万千。《民立七哀诗》哀悼七位《民立报》同事，概括他们的生平事迹，兼立传与招魂为一体，读来尤为感人。三是反映敌人的卑鄙与残酷。《春感》其三令人不忍卒读：

蹈海魂归尚涕零，义兼师友泣湘灵。
阿兄殉国全家烬，老母扶尸不忍听。

志士杨德邻惨遭袁世凯杀戮，其母扶尸哀嚎，白发送黑发的场面沉重无比。诗人同情、悼念志士，又表明立场，揭露敌人的残忍行径，表达愤怒之情。四是葆有斗志，激励来者。如《黄花岗歌》、《青年节歌》等，出以白话，简单易懂，便于宣传。总之，当目睹战友纷纷倒下，《诗草》中记录的“流血”、“骷髅”成为现实，诗人悲痛至极。但他明白，牺牲是“为解放被压迫的人们而英勇猛战”，“在民众的呼声里，完成了伟大的革命人生”（《黄埔战死者的挽歌》）。

除以上主题，这一阶段诗人还有不少品评书画，咏古、咏史及纪行之作。如《君马黄》等言情之作，朗朗清新，饱含古乐府之风。

3. 抗日战争开始至赴台前（1937—1949年）

1937—1949年，是于右任中期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激励抗战与呼唤和平成为此期诗歌最重要的主题，这一阶段留存诗歌计118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神州大地，祖国遭受蹂躏，诗人奔赴前线，以昂扬、充满使命感的诗语，呼吁中华儿女驱除侵略者，护卫神州大地。《中秋薄暮，黄陂道中见伤兵》、《长歌复短歌》、《军人荣誉歌》、《祖国颂》等，都是充满力量的战斗进行曲。与前期诗歌不同，诗人歌颂国殇，以笑当哭。“抗战，抗战！胜利在目前”（《万年歌》）的歌声响彻云霄，成为诗歌的主旋律。其间，四首《战场的孤儿》写河山沦落中的孩子，曲曲催

人心肺：

—

举国愁点兵，流往何处归？
孤儿点点泪，湿透母亲衣。

二

东村屋烬，西郭人逃亡。
吾父征胡去，何时死战场？

三

左邻小妹妹，右邻小弟弟。
狂寇虏之行，居心不能计。

四

战场几孤儿，祖国几行涕；
何人卫祖国？中华此孩子。

家园遭毁，父亲战死，孤儿寡母茫然失措。战争使祖国蒙难，使柔弱无辜的孩子无所依靠。诗人发出沉重一问：谁来保卫祖国，护卫我们的孩子？抗战结束后，诗人又积极反思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歌》直陈中日两败俱伤的惨况：

尔之败兮庶几自省，我之胜兮举国兵燹。尔之退出“窃自中国”之土地兮，我则啼饥号寒，颠沛流离，虽有千万亩良田，而无法生产。

战争给双方以灾难，诗人立足世界、立足人类，疾呼和平。国共和谈时，诗人又极力促成，和谈未果，诗人大为失望，自此郁郁寡欢。

于右任的中期诗歌以革命实践为轴徐徐展开，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的诗”。如果说《诗草》能审时度势、引领时代，归功于诗人的博学勤思，那么，中期诗歌的真实和深刻，则与诗人躬身革命、投身时代洪流之中的经历是无法割裂的。

后期（1949—1964年）

1949—1964年，是于右任诗歌创作的后期。七十高龄的诗人被裹挟至台湾，其原配夫人及长女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逾古稀、赴耄耋，孤独无依、抑郁苦闷的心情无以释怀，落叶归根的心愿难以挥去，对家乡和亲人的怀念愈益深沉。这些情感转化为诗歌，即产生了感人至深的“望大陆”系列诗篇。而诗人一生献身革命，回忆革命也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另外，诗人晚年政治失意，几番隐退不得，只有借山水、酬唱、书法以自遣。如此，唱和、应酬的闲情之诗也就多了起来。大体说来，“望大陆”系列诗歌最具价值，在创作数量上与回顾革命及闲情应酬之作各占三分之一。其中，写革命人生的作品，基本沿袭中期同

类诗歌而来，但又增添了新的人生感悟。大量应酬闲情之作，记录了诗人晚年生活的境况，流露出诗人晚年情感生活的点点滴滴。

独树一帜的“望大陆”系列诗篇，佳句迭出，名篇亦多。诗人将对大陆的感念、游子的情怀和人生的领悟，不留痕迹地整合入诗。思大陆、恋乡土、怀故人，在强烈的思念情绪中回荡着一股悲痛之情，悲痛中又不失倔强。如1951年所作《生日游草山柑橘示范场》云：“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寿一杯。”白发潇潇的老人，举目吟望，虽没有金戈铁马的气势，却也豪放无比。只是由于不知“归来”能否实现，而平添了几分惆怅。1952年故地重游，作《再游柑橘示范场》云：“同人争向中原望，天放晴光亦快哉。”均流露出浓烈的思乡之情。又如“夜深重读牧羊记，梦绕神州泪两行”（《题林家绰写牧羊自传》）；“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望雨》）；“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有梦》）等，故园之情，家国之感，流溢于字里行间。白发游子已然令人心酸，而对故乡的坚定守望，又让人不得不叹服这倔强的生命。

在“望大陆”系列诗歌中，尤以《鸡鸣曲》、《望大陆》感人至深。《鸡鸣曲》写于1956年，当时诗人已77岁高龄，诗中写道：“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鱼艇冲烟波。”此诗首二句为台湾民歌，拿来入诗，犹如己出。诗歌写大陆的福州与台湾的基隆隔海相望，黎明时分，诗人仿佛听见鸡叫声从对岸福州传来。鸡鸣尚且可闻，为何诗人一次又一次的呼唤，那些朝思暮想的人永无回应呢？哀伤之情，跃然纸上。《望大陆》更是一首传诵甚广的佳作：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此诗创作于1962年，在诗人去世后作为遗嘱传世。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0]（P260）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身后愿望

和对祖国大陆的殷切思念。¹²天后，诗人即创作了这首摧肝裂肺的《望大陆》哀歌。诗歌以白话入骚体，庄重肃穆，将家国之痛与民族之痛融为一体，感情充沛，感人肺腑。首句即交代遗愿：“葬我于高山之上兮”，诗人等了十几个春秋，也盼了十几个春秋，生命终于要枯竭，放不下的，是那炎黄子孙根脉所在的大陆，那诗人挂念她，她也挂念诗人的故乡。生不能归去，死也要继续守望。诗人选择安葬于高山，只要灵魂不灭，高处即可守望。“天苍苍，野茫茫”，本为北朝乐府民歌《敕勒川》原句，诗人照搬借用，是表达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与追踪，亦是其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至于“山之上，国有殇”，历来理解为祖国分裂，诗人忧虑民族之笔。如此解释，当然不差，但还应该有另外的含义，即表达对为国而殇的志士的缅怀。“国殇”的本义即“为国牺牲之人”，阵亡志士葬于“山之上”亦为常理。其实，从于右任的中期诗歌中也可以找到伏笔：“春满晒药场，登高哀国殇”（《再上晒药场谒滇军阵亡将士处》）；“凭高吊古，惟念国殇”（《辛亥以来陕西死难诸烈士纪念碑辞》）。“登高哀国殇”、“凭高念国殇”，与“山之上，国有殇”何其相似，可以说其“国殇”情思一脉相承，而悼念志士又是诗人中、后期诗歌一以贯之的主题，因此，不能也不该忽略其悼念国殇的含义。可见，整首诗穿梭于过去及当下，整合念国、思乡与国殇主题，传达出诗人凋零之际无法排遣的悲痛和绝望之情，理解为辞世嘱托也是恰当的。

于右任的后期诗歌，不论哪一主题，作品中基本都存在一个或明或暗的“我”。这个“我”不同于倡言革命、参加革命的“大我”，而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思念大陆、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提笔应酬的个体。诗人早年为革命呐喊，中年为革命前驱，晚年才腾出一点纸墨写一写“自我”，表达我的情感、我的诉求。《诗变》云：“人生即是诗，时吐惊人句。”我们不妨掠美，称之为“人生的诗”。

早年的于右任身处学府，但眼观世界、勤学好思，从书本中发掘拯救民生的真知灼见，《诗草》是其集中体现。《诗草》对形势的认识鞭辟入里，倡言革命痛快淋漓，认识价值、思想价值均值得关注。它的出版亦早于邹容的《革命军》。因此，既是时代的诗，也是早期革命话语体系的又一范本。1906年，诗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开始探索革命之路，屡败屡起，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这一时期

的诗歌，紧紧围绕革命实践，描绘革命的漫长与残酷，关注祖国与人民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诗人是时代的歌者，诗歌数量也占其创作总数的三分之二，可以认为是于右任诗歌创作的顶峰期。于右任的中期诗歌虽不像早期诗歌“语语革命”，但以革命为中心的骨架已建构起来，也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的诗”：一边革命，一边诗写革命，情与景的真实毋庸置疑。被裹挟离开大陆后，诗人在政治上虽居高位，但人生颇不如意，对根脉的眷恋日甚一日。诗歌创作进入后期，老诗人消去了早

期的无憚、中期的沉郁，变得老成持重，随心所欲。诗人写起了“我”，“我”的革命记忆、“我”的晚年生活、“我”的思念与临终嘱托。显然，这是诗人回忆人生，写晚年生活与心境的诗。柳亚子评论《右任诗存》云：“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11]（P785）其实，一代家国兴亡的恨，都付与了先生的笔下。这样一位诗人、这样一些诗是值得尊重的。不论于右任办报如何先驱先行，书法是如何“凌绝顶”的一代“草圣”，但我们绝不应该冷落这样一位歌者，以及这样一些诗。

[参考文献]

- [1] 马忠文. 于右任早期反清革命的“罪证”——台北故宫军机处档案所见抄本《半哭半笑楼诗草》[J]. 广东社会科学, 2014, (2).
- [2] 于媛主编. 于右任诗词曲全集 [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6.
- [3] 冯治, 刘孟信. 辛亥革命时期的于右任 [J]. 贵州社会科学, 1992, (9).
- [4] 升允. 请斥革举人于伯循由 [Z]. 台北: 军机处档(档案号 159796),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 [5] 邓之诚. 中华二千年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6] 邹容著, 冯小琴评注. 革命军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7] 鲁迅. 三闲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8] 刘延涛. 右任诗存·后记 [M]. 台北: 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 1957.
- [9] 毛翰.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6).
- [10] 许有成, 徐晓彬. 于右任传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 [11] 孙晶垚等编. 柳亚子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The Theme Focus of Yu Youren's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Poem Writing

ZHANG Bing, CHEN L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Yu Youren is a well-known poe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re are almost 800 extant poems.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poem writi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Before 1904, the poet pursued his studies by thinking and seeking for the way to saving the country, and wrote poems for guiding others for revolution and fighting against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imperialist; From 1906 to 1949, he followed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evolution. Meanwhile, he wrote many poems on the tough revolution the country suffered. From 1949 to 1964, the poet was coerced to Taiwan, and experienced his lonely time for missing the mainland. His poems during that period were mainly about "looking forward to motherland".

[Key words] Yu Youren; life experience; poem writing; theme focus

(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